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 中英礼仪冲突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美〕何伟亚 (James L. Hevia) 著
邓常春 译
刘明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美〕何伟亚 (James L. Hevia) 著
邓常春 译
刘明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 (美) 何伟亚 (Hevia, J. L.) 著; 邓常春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ISBN 978 - 7 - 5097 - 4609 - 7

I. ①怀… II. ①何… ②邓… III. ①外交礼节 - 中英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清代 IV. ①D82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5047 号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著 者 / [美] 何伟亚

译 者 / 邓常春

校 者 / 刘 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董风云 段其刚 张 骋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609 - 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466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by James L. Hevia

Copyright © 1995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经美国 Duke University Press 许可根据 1995 年英文版译出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王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
- 冯 军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
- 朱云汉 台湾中研院院士，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
-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
-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
- 汪 晖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 张异宾 南京大学教授、党委书记
-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 陈春声 中山大学教授、副校长
-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副主任
-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副局长
-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
-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先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

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作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译 序*

罗志田

中国有句古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胡适曾据此提出一种历史观：许多足以开新局面的事物，“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或许就是这样一类的事件。这一在当事人（至少是清朝当事人）看来并非特别重要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引起西方史家的密切关注，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诠释。各家比较一致的是都将此事件与半个世纪后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再以后众多的中外冲突和不平等条约联系起来考察，从后来的结局反观作始之时，的确有“几同隔世”的感觉。

具体到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诠释，占主流也比较不那么牵强的看法是一个为贸易所驱动的英国（帝国主义）之扩张与一个傲慢且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发生冲突；由于（顽固的）清廷与英使在是否按常规朝贡方式行三跪九叩礼这一问题上的争执，使团最后以失败告终。此事的失败体现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漠视和无知，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后果。

与西方学界对此事的关注相比（除通俗读物外至少已有好几本专书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对此似乎更多取存而少论的态度，文章不多（且以泛论即“评价”为主），第一本（似乎也是唯一一本）研究性专著是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朱雍的著作是在大量

* 本序据《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原载《历史研究》1999年1期）一文改写，观念和文字基本依旧，但对段落次序做了较大调整，并分成几个小节，希望能有利于读者。原文参考了 Robert A. Bickers, Kai-wing Chow, Pamela K. Crossley, Jerry Dennerline, John Lee, Nancy Park, Richard J. Smith 等人在英文学刊上的书评，特此说明并致谢。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7年1月25日（原书无页码），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

中英文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结论是：马嘎尔尼使团虽以失败告终，却是“一次颇有收获的失败”。他修正了过去认为清朝对外政策是“闭关自守”的观念，而提出“限关自守”的新见解（因为毕竟广州关一直是开放的），并指出这一政策在早期尚不无可尝试之处。

但他指出，到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时，乾隆帝仍“以限关自守的政策，狂妄自大地拒绝一切外交要求，尤其是合理的要求，就显得相当幼稚，相当顽固，相当可笑”。由于乾隆帝“拒绝同英国特使进行认真的谈判，结果问题还是问题，最后竟然由鸦片战争来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的限关自守政策的可悲结局”（朱著第304、306页）。这里的言外之意，似乎乾隆帝的限关自守政策应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负主要责任。这正是许多西方学者的看法，也是苏联学者的基本观念（苏联的中国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以及我们受其影响的相关著作中，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内容都出现在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一节之中，而不是其本应所在的18世纪末期）。

朱雍对此是提高到理论高度认识的，他认为乾隆帝的政策“在思想原则上背离民族利益和时代潮流。乾隆时期中英两国的冲突不是单纯的国务纠纷，而是两种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与封建主义时代）、两类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其中尽管带有民族冲突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为当时英国的战略意图主要不是军事侵略，而是用和平手段扩大经济利益”。乾隆帝在此时不能及时“对外开放”，而仍“抱残守缺”，结果“不仅违背了中华民族要求生存、发展和强大的根本愿望，而且脱离了世界经济大势，给中国社会种下了日后沦为半殖民地的祸因”（朱著第304~305页）。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当然依靠的是史家特有的后见之明，朱雍在书中多次明确提出，他正是以“现代眼光”来审视这一历史事件的。

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却对上述各种诠释提出挑战，该书于1995年出版后，在欧美学界引起褒贬不一的反应（以赞扬者为多）。对何著评价的歧异主要在书中所运用的后现代主义方法上（详后），但在文字上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知：有人说何著文笔优美，有人又说其文字晦涩难读。这大概仍与其研究取向有关：对熟悉后现代语汇和表述方式的人来说，何著的文笔或已近于优美；但对不甚熟悉之人，则其文字也真的接近晦涩难读的程

度了*。

有一点是清楚的，何著在西方世界（北美和西欧）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一本关于清代中国的著作短期内便有十余篇不同领域的书评，实不多见。即使对何著持有不同看法的评论人，也基本承认何著颇有创新之处，是相关领域里一本必读的参考书。《怀柔远人》终在1997年获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奖（最佳著作奖），表明学界对该书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下面就对这本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全书的简单评介

《怀柔远人》全书分10章，第1章阐述作者那偏重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取向及其思想资源，并对既存（主要是美国的）关于清代对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批评。最后一章通过讨论马嘎尔尼使团在不同时期（主要是西方）的史学及非史学的表述中的演变进程，指出从马嘎尔尼时代开始的“现代主义”观念当时就影响了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认知和诠释（因而带有偏见），并且至今仍在影响整个中国研究甚而整个史学领域。针对这一点，作者最后提出了矫正此类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史观。

具体探讨史事的是第2~9章。第2章将18世纪的满清王朝建构为一个文化、政治和种族都呈多元化的广阔帝国，并探讨其对国内不同族群及对外国的政策。作者认为这一政策的基础是清代的“宾礼”，并在第5章中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第3章转向英国，从学术思想等层面构建18世纪英国的文化和政治语境，并从当时马嘎尔尼所属的英国“知识贵族”对世

* 英文中大量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虽然都是常见词语，却均有其特定的指谓，很难依习见方式译成汉语，下面的拙译必有不准确之处，先请见谅。为免误导读者，凡概念性的词汇均附英文原词。

** 应该说明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不久即在香港杂志上对评奖提出抗议并痛驳何著，这又引起加大系统（洛杉矶分校）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和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提出反批评，不久加大系统（河滨分校）的张隆溪和复旦大学的葛建雄及我本人先后参加了进一步的讨论。参见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艾尔曼、胡志德：《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张隆溪：《什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式史学》；葛建雄：《就事论事与不就事论事——我看〈怀柔远人〉之争》；罗志田：《夷夏之辨与“怀柔远人”的字义》，分别刊于《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1998年2月号、4月号、10月号。

界、中国及国际关系的认知转入马嘎尔尼使团的筹备。第4章接着从英方记录考察直到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为止的使团过程，而第6~7章则从中方记录考察这一过程。第8章结合中英双方记录考察马嘎尔尼使团在觐见后的余波。以“宾礼与外交”为题的第9章其实是全书的结论，将双方对同一事件颇不相同的因应与记载上升到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观念体系，即英国的“主权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hierarchical inclusion）天下观的碰撞。

何伟亚认为：今日存在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是16世纪以来欧洲全球扩张的产物，并已成为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a naturalized hegemonic discourse）”。这里“自然化”指国家间应相互来往这一准则已成为大家接受的常识（其实一个国家或应有选择不与某些或所有其他国家交往的自由），而“霸权”则意味着没有此类交往传统的国家不得不按照他国制定的规则同意参与这样的国际交往（英文版第27页，下同）。同样，像过去那样在研究方法上“把西方客观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模式运用于非西方材料的研究”，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的意味。

他特别针对结构-功能体系理论、“对礼仪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观三项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西方流行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集三者之大成的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用“朝贡体制”来解释“中国之世界秩序”的系统观念，由于这一观念隐含的“西方先进/优越”而“中国落后/低劣”的先入之见，最后的逻辑结论自然是“满清政府既要为它自己的崩溃负责，也要为西方的炮舰外交负责”（应该指出，这样简单概括费正清等人的观念是不全面的）。何伟亚提出两个新的认识途径：一是他所谓的“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multitude of lords）”，这才是满清对其帝国的想象（imagining of empire），而不是什么“朝贡体制”；二是其著作的核心观念，即应更加注重清代的“宾礼”。

由于西人对异域的观察一向有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存在*，就解读马嘎尔尼使团而言，“清代史料对这一主题的叙述是无足轻重的，所有的史料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译解成观察者的话语规则，从而产生非常明显地声称优于历史上的中国当事人的知识，因为这些人处于表象与幻象的影响之下”（第19~20页）。这就是说，此前的学者常常把

* 详见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他们的“话语”(discourse)强加于清代材料,而何伟亚则拟“依据其自身的语汇来重建”满清帝国的“领土间”关系(注意他使用 interdomainal relations 以区别于通常使用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特殊性”,并据此提出一种与前不同的“理解(清)帝国礼仪”的新方式(第28页)。

在过去,西方“对礼仪作用的功能-工具性解释”中,礼仪是“古代或前近代社会的典型特征”而“缺乏充分自觉的理性”,这就使礼仪在惯常的传统与现代之分中居于“传统”一边,实际带有“落后”的贬义(在这里“礼仪/传统”与“理性/现代”是两分而对立的)。据何伟亚的理解,“宾礼”中的等级差序产生于并包含在天人关系的准则之中(即人是整合并扩展天道的执行者),礼仪控制着居上位者与居下位者的互动关系,是按天意行动的人去形成及完善天下秩序这一程序的一个部分。仪式上的表现(行为)囊括了广及宏观的宇宙(或天道)和具体到微观的个人观念态度,在此程序中某人/某国的地位高下及其对他人/他国的意向是通过礼仪中的方位和动作来体现的,因而一方观察另一方的态度和意向,即是否具有“诚意”,也通过其在礼仪中的表现*。

即使对何伟亚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周锡瑞也承认何伟亚在礼仪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加深我们对清廷礼仪的理解介绍了非常有益的概念和词汇”**。何伟亚以为,“礼仪的实施本身就会产生权力关系”(第21页)。正因为礼仪体现了权力关系的互动性调适(negotiation),清朝的宾礼虽然有固定的方位和动作安排,却不是完全依据定制的一成不变的生硬演示程序,而是在不同场合“可变而不拘泥的”(open-ended)。

他依据乾隆帝上谕中多次出现的“丰简适中”一语,得出“沿中线而行”(channeling along a centering path)的概念,并以之作为第6章的标题***。这一对译当然是不准确的,周锡瑞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并挖苦说

* 我的复述适当简化了一些我自己也不十分有把握的关于 discourse of agency 等的术语,在这里似乎天道的执行者(agent)在执行过程中又有相当自主性,参阅第19、131~132、216页。

** 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第113页,按周锡瑞实际上并不欣赏何诠释清朝礼仪的一些后现代“概念和词汇”。

*** A centering path 似乎意味着“中心”本身也是动态的,甚至可能是有意识的动作中轴。如果何伟亚确实这样看,则有些问题。在这里目标和手段的着力位置是不同的:“适中”虽然是追求的目标,但作用力则在宽和严或丰和俭的两端。这与上古举四方以定中央的典型中国传统思维是一致的(传统中国绘画中的“烘云托月”技法亦然,意在彼而迹在此)。一言以蔽之,力的作用点在两端而不在中心。

这充分体现了何伟亚的“后现代想象力”。不过，周与何在这里都有点“幸而言中”的意味。虽然何伟亚所表达的中文词语的语义要有限得多，但他对“适中”的感觉（sense）大致是不错的，这证明了他确有所提倡的“心通意会”（empathy）的能力。何伟亚将“适中”理解为一个包括导向性规范行为的过程，“这一导向行为包含在适中的进程之中，使行动避免走向极端”（第123页）。“宽严相济”的确是乾隆朝各项基本政策所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则，颇足以说明“适中”的结果正是朝廷在马嘎尔尼使团事件上追求的目标*。

具体到礼仪之上，“沿中线而行”意味着对礼仪参与者的行为安排非常注重“枢纽性的中心和多数参与者的能动作用”。何伟亚因而提出，清廷的“宾礼”“未必涉及赤裸裸的夷夏之辨”，而是一个“通过确定中心，将一切纳入满清帝国的统治之内”的过程。这一“适中过程允许差异——也将他人之权力以一种理想化的等级上/下（superior/inferior）关系纳入皇帝的统治之中”（第123~124、128页）。这样，“宾礼”不仅是清廷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和方式，而且体现了远更广阔的整合“天下”秩序的构想（这里反复出现的“统治”二字还需要加以界定，详后）。

何伟亚多次强调了清代“宾礼”在不同场合的“可变”性，而这一灵活性正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当然基本不欲违反体制（何伟亚曾猜测清代文献中“体制”一词的含义有时可能还包括皇帝本人的意志，说明他对皇帝的的作用甚为了解），但当他愿意灵活处理时，对绝大多数官员而言，上谕的分量恐怕超过礼仪文献。实际上，何著中重建的史实表明乾隆帝自始至终全面深入地卷入并具体指导了使团接待的几乎每一步骤（乾隆帝实际上可以随时修改礼仪的具体步骤这一点提示了“宾礼”规范政治行为的程度相当有限）。在一个以“人治”而非“法治”为特征的国度里，典籍中的“礼”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具体到马嘎尔尼使团之上，是皇帝还是“宾礼”更起作用呢？

在“法家”思想长期居于边缘且“法律”主要指谓刑法律例的古代中国，礼仪与实际政治的关联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直注意不够而今后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但清代“礼学”的兴起（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季民初，如廖平经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即礼）在多大程度上可从权势关系与权力运作的角度去考察、“宾礼”或相关钦定文献在后来19世纪清廷对外

* 参阅戴逸《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朱雍引用了此文并已将此观念运用于马嘎尔尼使团的考察。

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还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和深入探索。若深入考察清代“五礼”修典者当时的言论心态，或能反映修典是否真以“用”为目的。盖修典这一行动本身乃盛朝应有之“盛事”，初不必问是否真的要指导“政治”；到后来则或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其本身是否具此功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此作用，都还可考。

以前西方学界（在批判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多认为西方的扩张客观上推促了世界各地向“现代”的转化（即类似“现代化”的播种机），近年则越来越以一种多面相的发展视角来观察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何伟亚的研究在突破旧模式方面与上述趋势有相通或传承之处，但他对“现代”和“现代化”都颇有保留——他的后现代主义立场非常明确。这一立场以及他在研究中运用的后现代主义方法，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辩论和争议。今日中国大陆谈论“后学”的已较多，但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其实尚未真正进入史学领域，以下即简单介绍《怀柔远人》的史学取向和方法（主要见第225~226页、244~248页，并注意下面的“现代”二字皆是从后现代立场使用的）。

后现代史学

何伟亚以为，既存的中西史家所从事的不过是试图将虚设成分剔除于史事之外，即一种消极的辨伪（falsification），以此来净化历史事件及史学编撰。他要构思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史学”，即“不那么关注辨伪，而是更关注经过多重陈述的事件”。他将此称为“介入往昔”（to engage the past），大致意谓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史家参与或卷入其中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介入往昔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混杂进程之一部分”。

这种新型史学关注的是“各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而不是据简单的因果概念组织起来的互无联系的离散单位”。这样，“重构过去不仅仅是简单地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揭露以前的偏见。它也意味着主动介入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识的产生与传布（distribution）的政治之中。故问题不在于怎样使叙述更少偏见或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如何在多重诠释立场与我们日常应对的权力结构的关联之中确定我们自己的史学研究的位置”。

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构史学重构（d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即对相关题目的既存史学成果进行批判的评估。既然史学研究涉及权力结

构，则对史料的解释中也就隐含着权力运作。史料本身可能是含有偏见的，史家在史学研究中有意无意利用了这些偏见而强化与某些主流政治主张（正统）相接近或吻合的解释，而排除那些与正统歧异的解释*。何伟亚因而提出要“动摇史料（事实）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the taken-for-granted）关系”。

他要动摇或挑战的正是既存的产生史学知识的常规方式或常规进程：“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其叙述；将文明与民族自然化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据线性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以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the social）；并将历史发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在不论是国家、民族或是真理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倾向于将所有这些类型作为实用性学术探索的必须因素。这些词语、短语以及类型为研究程序提供了基础。”

而这些词语、短语以及类型又都是完全现代的。“现代主义试图把世界划分为互无联系的离散本体与完全可知的部分。但混杂物不仅从未消失，而且还在扩散；当混杂物生成时，跨越界限的泄漏已同时发生。”实际上，历史现象或者更多是“混杂的”而非“纯净的”，而且是处在一个不断混杂的过程之中（恐怕也未必都是可知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确实都是这样那样的混杂物，则过去与现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那种假定的断裂可能不过是一种现代主义虚设（modernist fiction）的特定类型而已。它并非这里所讨论的（真正）时空断裂，不过是一个我们必须跨越的想象出的间隔”。

这种超越既存界限的取向意味着更为开放的思维，“跨越界限的回报在于我们可能会把握到，无论多么短暂，还有其他行事的方式、其他存在于世界的方式。我们也可认识到还有其他类型的强制因素、其他的限制、其他形式的权势在形成与我们自己的迥然不同的主体性。倘能不将过去转化为与现在一致，或相反，若不先确立我们自己比前人更优越的信念，这样的允许歧异的介入意味着其他形式的批评，即比迄今为止依据启蒙理性而构想出的批评具有更广阔的人文精神之批评存在的可能”。这最终“有可能使我们再次体会到规律，而如今不过仅仅看到进步的出现与隐去”。

何伟亚要“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关系”这

* 在过去的史家利用了史料所含偏见一点上，我个人以为无意者居绝大多数，因为大部分史家或努力客观，或努力接近真实，或努力做到“科学”，总之他们在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或理当如此的事。当然，无意为之与有意为之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同样的。

一提法使一些常规史家感到惊异。艾尔曼和胡志德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史学“都是一个长期任不可一世的现代话语机制纵情践踏历史原貌的学术园地”，历史学家的事业应该是“揭开面具，并追问：论者为何要排斥其他研究视角，而被排斥的是否应该得到公正的审视”。何伟亚等人要做的，不是要“建立”任何模式，而是“在这样一个园地中重建一点多元性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个更贴近历史而不受现代民族国家的种种政治性计划约束的学术和思考空间”^{*}。

实际上，现代主义史家同样希望能“更贴近历史”，他们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分歧在于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比如，后之治史者是否“比前人更优越”，就是双方的一个大分歧。周锡瑞断言：“历史的事后认识加上来自近代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累积性知识，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拥有优于18世纪清廷的知识”^{**}。但这恰是后现代主义者所欲“解构”的：“近代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累积性知识”正是历史被“现代化”的理论渊源，而“事后认识”的优越是否能抵消今人与前人的时代隔膜这一弱点，也的确值得怀疑。

在某种意义上，“今人”与“前人”其实也和“我们”与“他们”相类，其间的“断裂”虽可能不过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虚设，但“间隔”仍是存在的。何伟亚根本认为：“生在某一国并说那一国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当地之过去有着特许的（先天）接近能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要理解当地之过去“仍需转译和诠释，而两者都要求心通意会（empathy）与想象力”。换言之，“切近历史”不仅主要不靠事后认识和现代知识，反而需要有意抑制这些影响，以更能与昔人心通意会。

这样一种“更贴近历史”的方式比较明显地体现在何伟亚的文化观上，对他而言，文化不应限于基本的信念和观念领域，也不是什么“系统”，而应该比过去所认知的更呈物质性、更多样化及更复杂多元、更侧重具体人与事的个性及歧异性、同时又更易于识别（legibility）并具有可整合性（constructedness），还应超越既存学术类别（如经济学、政治学等）^{***}。如克

* 艾尔曼和胡志德：《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127~128页。

** 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第113页。

*** 关于何伟亚对“文化”在史学中的应用及可能的作用，可参阅Judith B. Farquar & James L. Hevia, “Culture and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Positions*, 1: 2 (fall 1993), pp. 486-525, 其经过缩略的中译本刊在《文史哲》1996年6期。